

从留学经历到第二语言发展 ——两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对比案例研究

刘雨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DOI: 10.62836/jer.v4n7.1323

摘要：关键期假说认为，语言习得存在年龄敏感期，学习者在青春期之前接受二语输入更有可能达到接近母语者的语言水平。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留学经历所提供的沉浸式语言环境、高质量语言输入以及学习者的社会文化适应同样会影响二语发展。因此，仅从学习起始年龄解释二语最终习得水平存在局限性。本研究以两留学时机不同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其语言学习经历、语音发展、语法加工方式以及二语身份认同进行比较，探讨青春期前后留学经历对二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青春期前接受沉浸式语言环境的学习者在语音自然度、语法自动化加工以及二语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青春期后开始海外学习的学习者虽然较难形成接近母语者的语音系统，但留学经历能够提高其听说和交际能力；年龄并非影响二语最终习得水平的唯一因素，学习者对二语的长期投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我国英语学习者选择海外学习时机及方式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关键期假说；沉浸时机；二语习得；案例研究

From Second Language Immersion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Yuchen Li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learners who are exposed to a second language before puberty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native-like proficiency. However,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mmersive language environments, sustained language input, and learners' sociocultural engagement during study abroad also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second language (L2)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age of initial exposure alone cannot fully explain ultimate L2 attain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study abroad timing on L2 develop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who experienced overseas stud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Drawing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study compares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pronunciation development, grammatical processing, and L2 ident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learner who studied abroad before puberty demonstrates clear advantages in pronunciation, automatic grammatical processing, and L2 identity, whereas the learner who studied abroad after puberty shows improvement in oral fluency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 findings also suggest that age is not the sole determinant of ultimate L2 attainment;

sustained engagement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plays an equally important role in long-term languag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learners in selecting appropriate timing and approaches for overseas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L2 immers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se study

1 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年龄因素一直是国内外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关键期假说认为,人类语言习得存在一个年龄上的敏感时期,在青春期之前开始接触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更有可能达到接近母语者的语言水平,而青春期之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则难以达到此水平[1]。围绕这一观点,大量研究发现年龄对语音习得的影响尤为明显,早期学习者通常具有更自然的语音、语调和节奏,而成年学习者往往保留较明显的外语口音[2]。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年龄优势并不能完全解释二语发展的差异,高质量语言输入、学习动机以及社会文化融入程度等也会影响学习者最终的语言水平。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留学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获得真实二语输入的重要途径。与传统课堂相比,海外学习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加丰富、沉浸的语言环境,使其在课堂学习之外获得大量可理解输入和交际机会。现有研究认为,留学经历能够促进学习者听说能力提升,提高语言使用的流利度和自信心[3]。然而,目前关于留学经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对于其他时段的关注甚少。

此外,已有关于关键期假说的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关注学习者学习起始年龄与最终习得水平之间的关系[4],而忽略了学习者个人成长经历、语言使用过程以及身份认同的发展。事实上,二语习得不仅是语言知识本身的积累过程,也是学习者构建二语身份、适应目标语言文化的过程。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学经历不仅影响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还影响着其语言思维方式、学习策略以及对二语的情感认

同[5]。因此,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学习者的二语发展轨迹,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年龄因素对二语最终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两名教育背景相似但留学时机不同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名学习者于小学四年级赴英国学习生活一年,另一名学习者则在成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截至目前,两位学习者均有一年海外经历。通过对其学习经历和语言表现的比较分析,本文将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青春期前后留学经历是否会影响学习者最终的第二语言发展水平?

(2)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语言能力和认知加工层面?

(3)除年龄因素外,语言输入和第二语言身份认同在学习者长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两名具有相似英语学习背景但留学经历年龄相异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两位受访者均自6岁开始接受系统英语教育,至今接触英语时间均为13年。

A于9岁时随母亲赴英国生活一年,在当地小学接受全英文教学,留学经历发生于青春期之前。回国后继续接受国内英语教育,并长期保持较高频率的英语输入,包括阅读英文原著、观看英语影视作品以及与外教进行口语交流等。目前其托福成绩为110分,雅思成绩为8分,英语综合能力达到较高水平。

B同样自小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主要通过学校课程和课外培训接受系统英语教育,在国内完

成中学阶段学习后，于18岁赴澳大利亚接受大学教育。与A相比，其沉浸式语言环境开始于青春期之后。访谈时其雅思成绩为7.5分，具有较好的英语交际能力，语言使用主要集中于课堂学习和日常生活交流。

两位受访者成长背景、国内所受教育相似，主要区别在于接受沉浸式二语环境的时间不同。因此，两位个案能够较好地体现青春期前后留学经历对二语发展的差异。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围绕学习者英语学习经历、海外学习体验、语音习得、语法加工方式、语言使用习惯以及第二语言身份认同等方面展开，在保证访谈主题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受访者回答进行适当追问，以获得丰富完整的语言学习经历。

两次访谈均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录音，整理形成文字材料。为保证资料真实性，研究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受访者对语言学习经历的原始描述，并结合学习者英语水平、留学背景及语言使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个案研究虽然样本数量有限，但能够较为深入地呈现学习者长期语言发展的过程及背后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关注两位学习者语言发展轨迹的异同。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整理与分析访谈文本[6]。对访谈文本中学习者关于英语学习经历、语言使用和留学体验的描述进行初步编码后，根据研究问题将相关内容归纳为若干分析主题，最后结合关键期假说、输入假说以及文化适应理论，对不同主题下的访谈资料进行讨论。

结合已有研究及访谈内容，本文最终形成三个分析维度：青春期前后留学经历对学习者的语音发展的影响；不同留学时机对语法加工方式及语言自动化程度的影响；和留学经历对二语身份认同及学习动机的影响。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青春期前沉浸式语言环境促进了语音系统的自然建构

两位受访者均认为，海外学习经历促进了英语听说能力的发展，但两人的语音发展路径存在明显差异。A的英语语音主要形成于儿童时期的自然语言环境，B则是在国内课堂学习基础上，通过成年后的留学进一步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流利度。

A回忆，刚到英国时几乎听不懂英语，只能依靠语境、语气甚至肢体动作理解他人，随着在当地学习时间增加，逐渐能够自然地用英语理解、表达。他提到，当时并没有“英音、美音”的概念，而是通过听和模仿，对英语“声音”形成整体印象。这说明，其语音习得更多依赖自然语言输入，而非显性的语音规则学习。这种早期形成的语音系统一直保持到成年。A认为，相较于国内学习者，自己更容易察觉英语节奏、韵律和轻重读等方面的细微差异，对不同口音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例如，他在英国期间曾接触大量印度裔居民，现在理解印度口音也无障碍。

相比之下，B认为赴澳留学后英语能力确实有所提高，但提升主要体现在交流层面，发音本身未发生明显变化。她认为自己的英语口语是在国内学习阶段便已基本形成，海外学习更多帮助自己适应真实语言环境。现在理解印度口音“比以前容易一些”，但仍需时间适应。

综合两位受访者的经历可以发现，青春期前后的二语沉浸环境的差异使A更多依赖自然输入完成语音系统建构，B则是在既有语音基础上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这一结果与关键期假说中语音习得存在年龄敏感性的观点基本一致。

3.2 青春期前沉浸式学习促进了语法知识的内隐化加工

除语音能力外，两位受访者在语法习得方式上也表现出明显差异。A的语法习得以自然输入为主，其语法知识更多通过语言使用习得；B则主要依赖课堂学习语法规则，而后在交际中找到流畅表

达和语法准确的平衡。

A表示,英国当地教师不会系统教授语法,而是通过绘本阅读、课堂活动和日常交流帮助国际学生理解、使用英语。因此,他在当时“没有很强的语法意识”,很多表达是脱口而出的。所以,他刚回国时由于缺乏系统语法训练,英语考试成绩并不理想。随后,在国内接受系统语法教学后,成绩很快回升,他将这一过程比喻为“已经会走路,再学习为什么会走路”。语法学习对A来说更多是在已有语言能力上的总结和完善,而非语言形成的起点。这种学习经历使A在语言输出时鲜少需要母语转换,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使用英语思维完成表达,仅在涉及中国特色文化概念时才需要进行翻译转换。儿童时期形成的语言系统已经能够支持他自动化的语言加工过程,语法规则更多以内隐知识的形式存在。

B的英语学习路径则体现出典型的课堂学习特征。她坦言,刚到澳大利亚时,口语表达过程中十分关注语法是否正确,担心出现时态或主谓一致等错误。随着真实交流机会增加,她逐渐意识到日常交流更强调信息传递,因此表达时开始减少对语法规则的关注,逐渐能够自然流畅地进行交流。但她也表示,表达时常能意识到自己出现的语法错误,在复杂表达中也更倾向于使用简单句式,以保证表达的准确性。

由此可见,青春期前沉浸的语言环境更容易帮助学习者形成以内隐知识为主的语法加工模式,而成年后的语言学习则更多依赖显性规则支持语言输出。这一结果与Paradis(2009)关于内隐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分基本一致[7],也支持DeKeyser(2000)中儿童更容易通过自然输入形成自动化语言能力的观点[8]。

3.3 留学经历促进了第二语言身份认同的发展

两位受访者在二语身份认同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访谈结果显示,青春期前的海外学习深刻影响了学习者对英语的情感态度、学习动机以及自我认同;成年后的留学经历则更强调语言工具属性。

A多次提到,儿童时期在英国生活时,英语是

一种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生存工具”,如果不会使用英语,就无法生活。随着长期使用和持续输入,英语逐渐超越了交流工具的功能,成为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访谈中将英语称为自己的“第二人格”,并表示英语更像自己的“hiding place”,使用英语时比使用中文更加自信,也更容易表达真实想法。A表示,自己长期保持阅读英文原著、观看英语影视作品以及与外教交流的习惯,英语成为最主要的知识获取渠道。与此同时,他坦言,回国初期一度出现中文表达困难、阅读应用题吃力以及写作文不够流畅等现象,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受到英语影响。

相比之下,B认为,留学经历确实使英语交流变得更加自然,也降低了使用英语时的心理压力,但英语仅服务于学习和未来就业,而非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除学习需要外,她很少主动阅读英文原著或接触英语材料,回国后中文表达也未受到明显影响。

个案的比较表明,青春期前沉浸式语言环境不仅促进了语言能力的发展,也容易推动学习者形成稳定的二语身份认同。这种认同进一步增强了学习者接触英语的主动性,使英语输入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形成“持续输入—身份认同”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而成年阶段的留学虽然同样能够提升交际能力,却未必能够改变学习者对二语的基本定位。这一结果与Schumann(1986)

的文化适应理论以及Norton(2013)的第二语言身份认同理论基本一致,即学习者对目标语言共同体的情感投入和身份建构,会进一步影响其长期语言发展[9,10]。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两名具有不同留学时机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青春期前后的海外学习经历确实会对二语发展产生不同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单纯由年龄决定,而是年龄、语言输入以及第二语言身份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本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关键期假说关于语音习得存在年龄敏感性的观点。两位受访者最终都

达到较高的英语水平，但A在语音自然度、语调韵律以及不同英语口语的适应能力方面表现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来源于儿童时期真实语言环境，这一点与Flege et al. (1999) 关于儿童更容易获得接近母语者语音能力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1]。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青春期后的留学经历并不意味着语言发展受到明显限制。B虽然未表现出近母语者水平的语音特征，但真实语言环境仍提高了其听力理解能力、口语流利度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她表示，随着二语沉浸环境时间变长，自己在交流过程中减少了对语法错误的担忧，更能关注交流信息本身。对于成年学习者而言，留学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提高语言使用能力，而非重新建构语言系统。

此外，两位个案最显著的差异并非语言能力本身，而是第二语言在其生活中的定位不同。A将英语视为自己的“第二人格”，而B始终将英语视为学习的工具，其语言学习更多服务于现实需求。由此可见，第二语言的发展不仅是语言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学习者不断建构第二语言身份认同的过程。当英语成为学习者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其持续学习和使用英语的内在动力也会不断增强，这也呼应了Schumann (1986) 的文化适应理论和Norton (2013) 的二语身份认同理论[12,13]。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青春期前的海外学习确实更有利于语音系统和语言自动化能力的发展，但成年阶段的海外学习也能够显著提升语言交际能力。

5 结论

本研究以两名具有不同留学经历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比较了青春期前后海外学习经历对第二语言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青春期前接受沉浸式语言环境的学习者在语音自然度、语法自动化加工和第二语言身份认同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青春期后开始海外学习的学习者则主要在听说流利度和真实交际能力方面获得提升。这说明，留学时机影响第二语言发展的不同维度，其作用更多体现在语言能力的发展路径，

而非整体语言水平的高低。

研究进一步发现，年龄并非决定第二语言发展的唯一因素。持续、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和学习者的主动投入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儿童时期形成的语言优势只有在长期语言实践中才能得到保持，而成年学习者也能够通过真实交流和稳定输入不断提升语言能力。因此，相较于强调“越早学习越好”，更应关注学习者是否能够持续获得丰富且具有交际意义的语言输入，并形成稳定的第二语言使用习惯。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考虑到此研究仅基于两名学习者的个案分析，且主要依赖访谈资料，缺乏客观语言能力测试和长时间跨度的追踪数据，未来研究还可以结合更大规模的样本、纵向设计和语言能力测评，进一步探讨留学时机、持续语言输入与第二语言发展的互动关系，为关键期假说在真实学习情境中的适用性提供更加充分的实证支持。

总体而言，本研究认为，获得沉浸式语言环境的时机影响第二语言发展的路径，但持续、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和学习者的主动投入，同样是促进第二语言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 [1] Abrahamsson, N., & Hyltenstam, K. (2009). Age of onset and nativelikeness in a second language: Listener perception versus linguistic scrutiny. *Language learning*, 59(2), 249-306.
- [2] Birdsong, D., & Molis, M. (2001). On the evidence for 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4(2), 235-249.
- [3] Braun, V., & Clarke, V. (2006).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2), 77-101.
- [4] DeKeyser, R. M. (2000). The robustness of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2(4), 499-533.
- [5] Flege, J. E., Munro, M. J., & MacKay, I. R. (1995). Effects of age of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consonants. *Speech communication*, 16(1), 1-26.
- [6] Flege, J. E., Yeni-Komshian, G. H., & Liu, S. (1999). Age

- constraints o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1(1), 78-104.
- [7] Jackson, J. (2008).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hort-term stays abro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4), 349-358.
- [8] Johnson, J. S., & Newport, E. L. (1989).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gnitive psychology*, 21(1), 60-99.
- [9] Kinginger, C. (2009). *Language learning and study abroad: A critical reading of research*. Springer.
- [10] Paradis, M. (2009). Declarative and procedural determinants of second languages.
- [11] Savage, B. L., & Hughes, H. Z. (2014). How does short-term foreign language immersion stimulate language learning?.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24(1), 103-120.
- [12] Schumann, J. H. (1986). 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7(5), 379-392.
- [13] 杨莉芳.(2017). 儿童二语学习的核心问题:优势、规律、途径. *外语学刊*, 1, 97-103.

